

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 诸王王年的修正意见^{*}

陈久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09)

摘要: 文章从一个老历史家的角度,重新审视史学界为获得西周诸王王年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和对西周历法形态作出的各种假设,并重新定位西周历法:修正了以往的传统观念,推导出西周诸王王年,将历史文献、青铜器铭文记录、天再旦和五星聚合相配合,取得了较为圆满的结果。同时,还重新改定了所谓的共王标准器的王世。

关键词: 西周诸王王年;天再旦;五星聚会;克商之年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462(2014)03-0012-12

0 引言

自“断代工程”《简本》利用金文历谱推得的西周诸王王年公布以来,^[1]学界已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批判意见。笔者参与这个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一起提出这个西周诸王王年。这仅是一种征求意见稿,并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事实上,这个金文历谱,确实存在很多错误、缺点和不足之处。引起大家的批判、指正和争议,是理所当然的,需要加以改进。本文仅提出代表笔者个人的改进意见,与“断代工程”无关。现就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说明。

1 《简本》使用的西周历法

1.1 文献依据

《简本》使用的西周历法主要文献是《武成》记载的一月至四月伐纣之年若干大事的月日干支和用于记载日序所特有的专用名词“旁死霸”、“既死霸”、“既旁生霸”、等名词的含义和概念,以及《尚书·召诰》、《尚书·毕命》所载“二月既望”、“三月丙午朏”、“四月哉生魄”、“十又二年六月庚午朏”等。

1.2 考古依据

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西周时代的青铜器,其上载有王年、月、日干支,也可看出西周王室所使用的历法概貌。在记载月序和日序之间,同样载有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等字样。

将上古文献记录与近代出土金文记录加以对比,发现有既生霸(魄)、既望、既死霸(魄)三个月相名词,均为共有,这是我们讨论西周历法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两种文献又各有特点:1)上古文献中,记载月首的朏日,在金文中已不再使用;2)上古文献中,作为记日起点的旁生魄、哉生魄、既生魄、既望、既死魄,在金文中已不再出现;3)在金文资料中,却出现了大量的初吉月日干支,同时出现了大量既生霸、既死霸后面带有记日干支的记录。

1.3 西周的闰月

为了深入研究西周历法,有学者已将金文中有关闰月的记载作了系统整理,现引述如下:

中方鼎:“唯十又三月庚寅”(《集成》2785,西周早期)

* 收稿日期:2014-02-10。

作者简介:陈久金(1939-),男,江苏金坛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既尊：“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集成》6008，西周早期）

遣尊：“唯十又三月辛卯”（《集成》5402，西周早期）

小臣静卣：“唯十又三月”（《西周铜器断代》3.84，西周中期）

吴虎鼎：“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西周晚期）

叔矢方鼎：“唯十又四月”（《文物》2001年第10期，西周早期）

邓公簋：“唯十又四月”（《集成》3858，西周早期或中期）

雍公緘鼎：“唯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集成》2753，西周晚期）

正因为金文月日记录中，并未出现“朏日”的文字，却有很多关于初吉干支的记录。于是，有学者悟出了一月四分的历法观念，即大致是每月的前七、八天，为初吉之日；其后的七至八日，是上半个月的第二段，为既生霸之日；其后的七、八日，为一个月的第三段，以既望命之；其后的七、八日，为一个月的第四段，称为既死霸。至目前为止，已有相当多的金文月相干支，被证实确实落在此范围内，故至今，在考古界和史学界，仍有许多人相信四分月说。

四分月说还在不断发展，为了寻求更多的历日记录与其相合，有人又作西周前半段以朏为月首，后半段为朔首的假设。至于既望，大多学者比较一致地就是以实望为起始点。就这点而言，目前还未见有不同的说法。作这种假设的人从未想到过，若以朏为月首，就会出现上半月只有十三天，下半月为十七天的矛盾，这就太复杂了吧？如果四分月说不用朏为月首，那么人们应该如何理解西周出现的历法名词？

四分月说还有以下问题无法解决。

1) 世界各国的古代历法，都是以推步为周期纪年、纪日。东方习惯以十二地支和六十干支为周期；西方，甚至印度和东南亚，均习惯以日月金水木火土，即以七为周期。四分月说难道以七为周期么？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可以用自己不懂历法为托辞，作出七、八日这个模糊观念，可制定历法的人却需要一个确定的数字为周期。必须明确指出，四分月说与七这个周期，是没有共同之处的。也就是说，以四分月说的观点，在历法上是无法推步的。故研究历法史的学者，是无法认可这种历法的存在。

2) 如果确实有四分月说的历法，那么保存至今的各段历日记录，应该大致相当，可实际情况是极不平均。初吉的记录，远比其他3个记录多，而有关既死霸

的记录，至今只有5条。这不能用偶然来解释。这也说明四者很可能不是同一时段概念。

3) 很容易证明，春秋战国时代已使用四分历，即所谓古六历。可在春秋战国的文献中，以及该时代出土的金文中，仍有初吉记录的出现。这也足以说明，初吉不是四分月中的一段。

4) 初吉干支，并不全都落在月初的七、八天。这一结论，已为黄盛璋“初干吉日说”和刘雨的专题论文所证实。《简本》金文历谱，也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学者，并不认可考古、史学界流行的四分月说。

从汉代开始，刘歆提出死霸朔、生霸望、上半月为既死霸、下半月为既生霸以来，霸即魄的概念，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刘歆以为魄是指月亮的黑暗部分，由于上半月月亮的阴影部分慢慢消失，故称既死霸；下半月月亮的阴影部分不断增大，故称既生霸。如今，虽然仍有人相信刘歆的观点，并修正其观点推导西周金文历谱，但毕竟这是少数人的意见。目前，出土的西周金文历日记录，越来越明确地证明，正好与刘歆的观点相反。霸、魄为月的光亮部分，生霸为产生月光，为上半月；死霸为失去月光，为下半月。

有了以上正反两方面的资料，我们也就有了进行学术对话的基础。那么，西周王室的历法究竟是什么样的，具有哪些特点，若对以上资料细加分析，西周历法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 西周的历日记录中，具有众多的与月亮圆缺有关的名词，例如朏、既望、既生霸（魄）、既死霸（魄）、旁生霸、哉生明等。初吉虽与月相无明确的直接关系，但“初”字的含义，也当与月初或第一次有关。由此可见，西周历法中的“月”，当以月亮圆缺为周期。即大月30日，小月29日，做周期性的循环。但目前尚未发现安排大小月的规律和法则。

2) 西周以月序记月，自一月至十四月均有记录。既然以月亮的圆缺周期记月，那么，一个回归年只有12.4个朔望月，其十三月就当是闰月。为什么有十四月。上古中国的“四”字，以四横笔“三”表示。有人为了论证西周只有十三月，没有十四月，指出四横中有一横较短小，当是“三”字的误写。但事不过三，现在已有四条证据，误写说是不能成立的。还有一种解释是一年再闰的说法，因为东周时，仍有一年再闰的记录。由于我们对十四月的记录不甚了解，只能将其作为一年再闰来理解。

3) 与春秋战国以后以合朔定月首的方法不同，西周历法以朏日为月首。朏日者，初见新月之日也。大多出现于合朔后第三日，有时在二日至四日。若以平朔

推算,加上早期历法推算不精,甚至会有更大误差。

4)西周历法中,有以“既望”为日名的特殊名称,用作定点,经常出现。它与朏日相对应,二者均可作为记日的起始日。可见朏日和既望,为一个月中的月初和月中的两个定点。用简明的话说,为一月两分,即二分说。它不是我们的创造发明,先贤著名天文学家日人藪内清即持此说。它也不是藪内清的发明,因为古代印度和东南亚早就推行使用了二分法,泰国和中国的傣族至今仍沿用不改。可见二分法是早在古代就已流行的历法。

二分法将一月均分为两半,显然,既望的日期,不是以定望的时刻确定的。朏日为朔后二、三日,既望就该是朔后的十七、十八日。加上平望前后的两日误差,其日期可在十六至二十的范围内变动。因此,我们对此还特别强调,这种历法的月初第一日,即朏日,或哉生霸、哉生明、旁生霸、方生霸等,均为这种历法的月初第一日定点。既望、旁死霸、均为月中定点,是下半月的第一日,是初见月亏的第一日。

根据以上说法,朏日、旁生霸、方生霸、哉生霸、哉生明,都是记日的起点。那么,记日的起点不是太多了么?但如果对这些名词的含义细加推敲,可以发现,旁者方也,方者刚才发生也,哉者才也,才者刚也。哉生明者,即哉生霸也。均为同一天的同一概念。既望与哉死霸的概念与以上同解,为下半月的第一天。

由此可以发现,我们设定的既望之日,与人们通常所认定的既望,即定望日期,大致有两日之差。即以往认定的既望为农历的十四、十五、十六,而我们设定的既望为十七、十八、十九。

包括席泽宗、薄树人、张培瑜、陈美东和笔者在内的老一代天文史家,都被邀请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目的,正是由于他们有古代天文历法的专长。笔者被认定为西周金文历谱的主持人,也是由于笔者具有研究上古天文学史和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专长。我们组成一个团队,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事实上,以上认定的西周历法,也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在“断代工程”内部多次专门讨论金文历谱的会议上,都未听到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薄树人对西周历法一直未表示过意见。张培瑜确实提出过伐纣之年应更靠近公元前1027年前后的意见,主要是更合于武丁五个月食的需要,但从未说过伐纣之年就是公元前1027年,也从未说过《古本竹书纪年》就是伐纣的年代。

陈美东大致赞同笔者对西周历法的意见,他曾邀请笔者与他合作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中的上古部分就是实证。只是在个别问题上,他曾表示过不同意见,如厉王末年与共和元年重合的主张。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是明确支持二分说的。在“断代工程”内部交流的论文中,金文历谱课题组成员彭裕商,曾指出西周历法中的既生霸、既死霸是公名。表示某日的干支时,通常应如《武成》那样,“×月旁生霸,越×日××”,或“×月旁死霸,越×日××”。金文可能为了简明省字,省略了“越×日”三个字,才导致二者表述上的差异。席泽宗很看重这个意见,向我们推荐了它。我们曾仔细地分析了彭裕商的意见,并且将其与傣族历法作对比,认为二者是共通的,由此“断代工程”将其写入《简本》。

有学者曾对此提出批评:“金文历谱两说并存,在同一个金文历谱中,不定点说与定点说杂陈并存,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只能说明工程的专家们,对这些词语的确切含义是不甚了解的。”我们没有说过定点说和不定点说并存的概念,只是引用傣历加以说明,傣历流行了数千年,未曾听说过对词语有什么“不甚了解”。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对傣族历法做过专门的调查,并对这些资料也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用他们的方法推算过数十年历谱,不能认为是不甚了解。那么,傣族历法是什么样的呢?现引述傣历的纪日方法。

傣历纪月,按月亮的盈亏而定。月亮的一个圆缺周期就是一个月。单月为大月,三十天;双月为小月,二十九天;闰月都闰九月,是单月,也一律三十天。每月按月亮的圆缺,分上下两个半月。上半月十五天,下半月十五天或十四天。上半月的第一天(初一)称月出一日,第二天称月出二日,直到月出十四日。月中十五日傣语叫登柄,意为月圆之日既望日,仍归上半月;下半月第一天不称十六日,而称月下一日,直至月下十四或十五日。下半月最末一天傣语称登达普,意为月黑之日即晦日。

傣历除了有每月分上、下两个半月的日序纪日法之外,还有七日一周的纪日法,各周日的名称,是根据日、月以及火、水、木、金、土五个星名的顺序来取的。七天中的每一天,与日、月或一个星名对应起来。

傣历的干支和汉历相同,即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共六十数,为一个循环周期,即等于汉历的一个花甲子。……干支纪时法又与纪元纪时法紧密结合起来,成为现在傣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

从以上介绍可看出,我们设定的西周历法,与傣历属同一系统。由于相隔久远,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西周历法还处于原始状态,而傣历已有完整的推算方法;傣历以平朔、平望为上下半月纪日的起点,称为月出一日至十五日,月下一日

至十四或十五日。“月出”、“月下”也可译成“白半月”、“黑半月”。西周历法则称为“既生霸”、“既死霸”，观念是一样的，只是具体名称或译名不同而已。它们都要从月初、月中的定点出发，顺次纪日，这便是批评人所误会的“定点说和不定点说两说并存的不正常状态”，他们都是对这种历法的不理解，有了傣历作比较，误解也就自然消除了。

这类历法的相同之处，也就是二分法的基本特点，是以月初、月中为界，将一个月均分为两半，称为白半月、黑半月，或称为生长光的半月和失去光的半月。我们可以举例加以说明：如果傣历推得某年一月一日的干支甲寅和周四日，其纪日的方法便是傣历纪元×××年一月月出一日甲寅日周四日，月出二日乙卯日周五日，……月出十五日（登柄）望日戊辰周四日，月下一日己巳周五日，……月下十五日（登达普）晦日癸未周五日。二月一日月出甲戌日周六日，二月月出十五戊子日登柄周六，月下一日己丑日周日，月下十四日壬寅周日。“月出”、“月下”四字，也可换成“白月”、“黑月”。

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看出，西周金文的纪日方式，与傣历是相似的。仅傣历多了周日的表述方式，而周日的表述目的，只是出于佛教的特殊需要。傣历中的“月出”或“白月”二字，就相当于金文中的“既生霸”；“月下”或“黑月”，相当于“既死霸”。唯月出、月下的含义，含有“越×日”的意思，在金文中省略了，但在西周《武成》等文献中则仍然保留着。

2 初吉的含义和在金文历谱中的作用

初吉为四分月说中的第一周的观念既已被否定，为了深入讨论初吉的性质及其在金文历谱中的作用，现将《简本》引用过的四要素俱全的初吉资料，按干支顺序排列如表 1。

表 1 所载四要素俱全的初吉资料共 32 条。以初吉干支序数排列，可以看出每个干支的初吉出现的次数，便于探讨初吉的性质。在 32 条初吉记录中，共有 14 个干支有初吉记录，在 60 干支中只占少数。经统计，其中丁亥就占了 10 个，甲戌和庚寅各占 4 个，仅 3 个干支的初吉，占全部初吉记录的一半还要多，可见初吉之日，在干支中是极不均匀的。其中有相邻两千支均可初吉记录者，也有连续 13 个干支间均没有初吉记录者，这是喜欢创立初吉学说者必须加以关注的。

表 1 《简本》引用四要素俱全的初吉资料统计表

Tab. 1 CHU JI Data Tables in Jianben

干支序数	初吉干支	铜器名称	铭文
6	己巳	史伯硕父鼎	六年八月初吉己巳
11	甲戌	虎簋盖	卅年四月初吉甲戌
11	甲戌	宰兽簋	六年二月初吉甲戌
11	甲戌	师俞簋盖	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11	甲戌	师晨鼎	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15	戊寅	十三年疾壶	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
15	戊寅	晋侯苏钟	卅又三年六月初吉戊寅
16	己卯	番菊生壶	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
18	辛巳	伯大祝追鼎	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巳
24	丁亥	齐生鲁方彝盖	八年十二月初吉丁亥
24	丁亥	吴方彝盖	二祀，二月初吉丁亥
24	丁亥	散伯车父鼎	四年八月初吉丁亥
24	丁亥	散季簋	四年八月初吉丁亥
24	丁亥	师鞞簋	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24	丁亥	三年师兑簋	三年二月初吉丁亥
24	丁亥	郑季簋	元年六月初吉丁亥
24	丁亥	师鞞簋	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24	丁亥	鞞簋	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24	丁亥	虢季子白盘	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27	庚寅	王臣簋	二年三月初吉庚寅
27	庚寅	谏簋	五年三月初吉庚寅
27	庚寅	克罍、钟	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27	庚寅	克盃	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29	壬辰	睚攸从鼎	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
35	戊戌	师望簋	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
35	戊	师望鼎	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
39	壬寅	无彘簋	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47	庚戌	膳夫山鼎	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
47	庚戌	五年卫鼎	五年正月初吉庚戌
51	甲寅	柞钟	三年四月初吉甲寅
51	甲寅	元年师兑簋	元年五月初吉甲寅
52	乙卯	趯尊	二祀三月初吉乙卯

人们常引用《诗·小明》毛传“初吉，朔日也”和《国语·周语》“自今至于初吉”的韦注“二月朔日也”为据，用来证明西周的初吉就是朔日。应该承认，以上所载两个初吉都是东周的朔日。非但如此，我们也可以证明，西周金文中的某些初吉就是初一日。但是，从事西周考古的人越来越明白，西周的朔日或初一，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初吉，例如将表 1 所载 10 个初吉丁亥都证明是初一就不可能。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的四分月说、二分月说、初干吉日说，直至最近刘雨先生才提出的“初吉可能出现在月中的任何一天”。断代工程内部对初吉的含义也缺少研究，对刘雨先生的观点未加重视，盲目地采用了初干吉日说，即每月的前十天都是初吉。但事实上，《简本》金文历谱中的初吉，也已经越出了十日的范围，与刘雨先生的意见没有差别。

对于刘雨论证的结论，根据表 1 所示，初即是每月的第一个，吉是吉利的日子。由于吉日的选取只是方家所为，各有各的标准，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方家认定的初吉干支就不一定落在前十天之内。还有一种解释是张闻玉先生所主张的“丁亥为亥日例”、“庚寅为

寅日例”。由于丁亥、庚寅、甲戌等为公认的吉日,凡是亥日、寅日、戌日等干支,也可附会为初吉。^[3]在这份修订的金文历谱中,我们也只能做到尽量合理地往前靠,有越出前十天者,也只能由其客观存在了。

即便如此,初吉记录对于确定西周王年,仍然有着重要作用的。至少在该王年中包含有这个王年,在该月中确有这个干支。

3 西周金文历谱以及诸王王年的推定

有了对西周历法和初吉的基本认识以后,就有了推定西周金文历谱和诸王王年的基础。认识到西周纪日方法具有胙日和既望日两个定点以后,推定金文历谱便呈现以下基本事实:只要诸王王年确定,这两个定点也就是固定的。因此我们便可找到排谱的一个基本技巧,先确定诸王世中的定点既望和胙日,用以确定诸王在位年数的框架,然后再分配既生霸、既死霸和初吉的干支。如果它们确是该王世的干支记录,那就一定在我们设定的范围之内;如果月相干支不合,那就别求他王。

西周的金文历谱的推定,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3.1 寻找尽可能多的可靠的西周诸王王年的记录

1)前人已经注意到幽王、宣王、共和三世的时代是已知的,载在《史记·周本纪》。为幽王十一年(前781—前771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前827—前782年)、共和十四年(前841—前828年)。2)《周本纪》有三十七年“厉王出奔于彘”的记载。3)《帝王世纪》有“周自恭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的记载。4)《古本竹书纪年》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5)《周本纪》有“穆王立五十五年崩”的记载。6)《周本纪》有“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7)《周本纪》有“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8)《尚书·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甲子,越翼日乙丑,……丁卯,越七日癸酉。”9)在康王之前,几乎每一个王世,都有一个或几个既望干支可以作为该王世的定点月相。10)《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胙,越三日壬申。”11)《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胙,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12)《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厥四月哉生明,……丁未,……越三日庚戌。……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会于牧野。”

其余月相,仍需金文补充,以期求得西周完整的

王年。

3.2 利用最后两个已知王世的四要素俱全的记录,验证各名词的月相日序

如表2,排入幽、宣王世的铜器共10件,均系考古专家研究后定为西周晚期器。大部在宣王,仅柞钟和史伯硕父鼎在幽王。推排的结果全部符合我们新设定的日序范围,仅有伊簋的既望干支,非但西周晚期,直至中期的共王都无法排入,所以一定是干支有误,将丁亥改作丁丑以后,正适合既望定点的日序。

表2 西周宣幽二王王世的四要素俱全
资料之月相日序验证统计表

Tab. 2 Phase of the moon Statistics in Western
Zhou(827 BC—782 BC)

编号	文献或器名	王年	公元纪年	年月日干支纪时词语	推排结果
宣王(前827—前782)					
71	鬲簋	宣二	前826	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正月丙戌朔,丁亥二日
72	颂鼎、壶、簋	宣三	前825	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五月戊申朔,甲戌二十七日
73	兮甲盘	宣五	前823	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	三月丁卯朔,庚寅二十四日
74	此鼎、簋	宣十七	前811	十七年十月二月既生霸乙卯	十二月癸丑朔,乙卯三日
75	吴虎鼎	宣十八	前810	十八年十月三月既生霸丙戌	十三月丁丑朔,丙戌十日
76	起鼎	宣十九	前809	十九年四月既望辛卯	四月甲戌朔,辛卯十八日
77	伊簋	宣二十七	前801	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丑)	正月庚申朔,丁丑十八日
78	膳夫山鼎	宣三十七	前791	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	正月癸巳朔,庚戌十八日
幽王(前781—前771)					
79	柞钟	幽三	前779	三年四月初吉甲寅	四月辛亥朔,甲寅四日
80	史伯硕父鼎	幽六	前776	六年八月初吉己巳	八月辛酉朔,己巳九日

按照《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所述,至少有吴虎鼎、此鼎、兮甲盘三件铜器可以确定是宣王时代器。考古专家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以下简称《铜器断代》)均说“应视作宣王标准器”、“学者公认盘(鼎)为宣王时期器。”^[4]由此可以推得吴虎鼎的既生霸为农历10日,此鼎的既生霸为3日,兮甲盘的既死霸为24日。同时,被他们确定为西周晚期器的,有合于宣王世的颂鼎既死霸为27日,起鼎、伊簋的既望均为农历的18日。由此我们可明确宣告:刘歆系统的死霸朔为上半月定点、生霸望为下半月定点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既死霸可以是农历的24、27日,似乎还可以合于四分月说,但此鼎的既生霸,可以是农历的3日,则彻底打破了四分月说存在的可能性。按照四分月说,它只能介于8日与15日之间的第2段。由此检验的结果,西周历法,只能是以胙和既望为上下两个定点的二分说。

务必注意的是,按二分说,初一(胙)距既望(哉死霸)只有15天。由此可证西周时的初一是胙日,而不是朔日。这里必须作出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初一为胙

日,初吉就不能是朔日或在朔日前,故我们对虢季子白盘和此鼎的王世作出调整。调整后的王世,更与《铜器断代》的说法相合。

3.3 厉王与共和的金文历谱

本周厉五王年年表(表3)共安排铜器23件,共和世无器。对比《铜器断代》,这批铜器绝大多数都落在西周晚期,仅个别落在孝夷时期。为了与月相相对应,作出这样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断代范围允许的。

表3 西周厉王王年月相日序验证统计表

Tab. 3 Phase of the moon Statistics in the age of the king of Li of Western Zhou

编号	文献或器名	王年	公元纪年	年月日干支纪时词语	推排结果
厉王(前877—前841)					
48	逆钟	厉元	前877	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	三月辛亥朔,庚申十日
49	元年师兑簋	厉元	前877	元年五月初吉甲寅	五月庚戌朔,甲寅五日
50	郑季璽	厉元	前877	王元年……六月初吉丁亥	六月庚辰朔,丁亥八日
51	师俞簋盖	厉三	前875	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三月己巳朔,甲戌六日
52	师虘鼎	厉三	前875	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三月己巳朔,甲戌六日
53	四年虘璽	厉四	前874	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	二月癸巳朔,戊戌六日
54	谏簋	厉五	前873	五年三月初吉庚寅	三月丁亥朔,庚寅四日
55	牧簋	厉七	前871	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	三月辛丑朔,甲寅十四日
56	师楚簋	厉十一	前867	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九月己卯朔,丁亥九日
57	虢季子白盘	厉十二	前866	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正月丁丑朔,丁亥十一日
58	大师虘簋	厉十二	前866	正月既望甲午,惟十又二年	正月丁丑朔,甲午十八日
59	大簋盖	厉十二	前866	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	三月丁丑朔,丁亥十一日
60	伯克壶	厉十六	前862	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	七月辛巳朔,乙未十五日
61	克罍、钟	厉十六	前862	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九月庚辰朔,庚寅十一日
62	番驹生壶	厉二十六	前852	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	十月辛亥朔,己卯二十九日
63	寰盘	厉二十八	前850	廿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五月壬申朔,庚寅十七日
64	敝攸从鼎	厉三十一	前847	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	三月丙戌朔,壬辰七日
65	伯大祝追鼎	厉三十二	前846	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巳	八月戊寅朔,辛巳四日
66	晋侯苏钟	厉三十三	前845	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正月丙午朔,戊午十三日
67	晋侯苏钟	厉三十三	前845	二月既望癸卯(辛卯)	二月乙亥朔,辛卯十七日
68	晋侯苏钟	厉三十三	前845	二月既死霸壬寅	二月乙亥朔,壬寅二十八日
69	晋侯苏钟	厉三十三	前845	六月初吉戊寅	六月癸酉朔,戊寅六日
70	伯克父璽	厉三十三	前845	卅又三年八月既死霸辛卯	八月壬申朔,辛卯二十日

厉王世可以安排如此众多的青铜器,令人眼花缭乱。首先想到的是“三十七年奔彘”的记录,看此记录是否与专家们定在厉世的几件主要铜器的月相相合?首先注意到的是寰盘和大师虘簋,两件定点既望的记录,尤其是寰盘,《铜器断代》明确地说“为西周晚期厉王前后器”,以它作为厉世定点没有争议。若共和元年为厉王37年后的一年,厉王元年为前878年,得二个既望均为农历的22、23日,与月相不合。但若后退1年,以前877年作为厉王元年,则得二器的既望日为

17、18日,正合于我们设定的日期。考之于厉王世的其他器物也合,于是,厉王末年与共和元年重合的结论,就是这样得到的。

晋侯苏编钟出土于晋侯墓地M8中,共16件,铭文共355字。记有7个历日和5个纪时词语,为西周金文所唯一代表:

惟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辛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宣王和厉王。对M8墓中木炭作常规14C年代测定,为公元前808(8年,而据《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年为宣王十六年(前812年),《史记》所载晋侯苏的卒年与14C所测吻合,如果是宣王33年,为前795年,入葬的年代要早多了。所以苏钟所载的33年当属厉王。这一结论,已为大多数考古学家所认定。

马承源等先生认为,厉王33年为前846年,其二月两个干支是颠倒了,应该互相对调。改正后的结果是正月辛亥朔,二月辛巳朔,苏钟正月既生霸戊午为8日,二月既望壬寅为22日,既死霸癸卯为23日,均合于四分月相,“好似为一月四分月相说和定点月相说的长期讨论,作了一个异常明确无误的结论。所谓定点月相说是不真实的。”

首先我们要指出,马先生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其一,传抄中出现干支相邻,只能看作偶然现象,不能作为可以对调的证据,同时改动两对干支中的4个字,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可信度肯定不高。其二,马先生使用的是以朔为月首的历法,若改为以朏为月首的历法,就都不合了。而经过以往论证,西周是以朏为月首的。再说既然要论证四分月说,只讨论了3个元素,尚未涉及初吉,就下这样的结论也许太早了一点。其三,马先生讨论西周行用什么历法时,忘记了讨论六月的干支记录。但实际上,该年六月无初吉戊寅这个干支。由此证明苏钟历日与该年不合。

我们认为,苏钟所载厉王33年为前845年。则上年有闰月,正月丙午朔,正月既生霸戊午为13日;二月乙亥朔,二月既望辛卯为17日,既死霸壬寅为28日;三月方生霸丙午为2日;六月癸酉朔,初吉戊寅为6日,丁亥15日,庚寅18日。

有同行指出,厉王37年不应该与共和元年相重合。对于厉王历谱,我作过多种尝试,开始时没有重合,最终改成重合的理由主要有四条。首先,如果不重合,则厉王三十三年六月当没有初吉戊寅这一天。当

然,西周的历法当以朏日即哉生魄为每月的第一天,六月朔日为己卯,苏钟六月初吉戊寅为晦日,距六月第一天哉生魄太远.其二,按金文历谱,在厉王时代当有三次既望记录,除苏钟外,还有大师虢簋十二年正月既望甲午和寰盘廿八年五月既望庚寅.如果不重合,苏钟的既望为11日,大师虢簋和寰盘的既望均为12日.由于我们认定西周的历法为二分说,这三个既望均越出了我们设定的范围.而如果将二者重合,可得苏钟和寰盘之既望为17日,大师虢簋之既望为18日,正处在我们对既望的设定范围.按二分说的意见,既望是下半月的第一天,是定点,其误差的变幅前后不能超过两天.故不得不将二者重合.其三,被前人断为夷历时期的三十三年伯窳父盨,由于夷王年不长,故只能在厉世.二者重合,可得既死霸辛卯20日合.若不重合,推得既死霸辛卯为14日不合.其四,从实际出发,也有重合的可能性.厉王既是被国人赶跑的暴虐国君,共和执政,当改变政策,自然就有当年改元的可能.于是,可定厉王元年前877年.

至于被专家们定位为“厉王前后器”的两件师兑簋,在是否属于同一王世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是低王年,我们认定的初吉并没有必须是前10日的规定,故二器无论是同一王世或不同王世,都无关西周王世的确定.

3.4 共懿孝夷的金文历谱

《帝王世纪》关于自共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要想弄清连续四世不明的难题,几乎不可能.但是,似乎幸运特别关照我们.由于特殊情况的出现,使得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了.这两个特殊情况便是天再旦记录的认证和对赵曹鼎王世认识的改变.

1)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记录考定为日环食.关于这一点,只有当科学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才能认识到.这是因为,直到最近几年,天文学家才开始认识到,公元前9世纪前后月亮不均匀运动改正正常数能使公元前899年日出前后的日环食,确实发生在陕南地区.从而证实了《古本竹书纪年》的这条记录,就是懿王元年人们看到的日环食.由此可以确定懿王元年,就是公元前899年.

2)必须改变赵曹鼎为共王标准器的认识.有了懿王元年,也就知道了共王末年为前900年.共王元年可用共王标准器来确定.有哪些器可以确定为共王时器呢?据《铜器断代》认定,十五年赵曹鼎是共王标准器,其余还有“共王前后器”走簋、休盘和卫鼎诸器.十五年赵曹鼎说“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按《汉语大字典》、《辞海》等说:“龚, gong 工, 共的本字, 通

恭.”《帝王世纪》作恭王.故大家都认为龚王即共王,赵曹鼎为共王器确定无疑.我们在《简本》即是以此为依据确定的共王元年,以至于穆王55年和共王重叠一年等.

然而在这一标准器的指导下,实际与共王时的走簋、休盘等的月相是不合的,导致两个既望均出现在农历23日的不正常状态.此事一直使我们心存不安,赵曹鼎会不会不是共王器呢?我向著名考古学家请教,得到的答复毋庸置疑.我仍持怀疑态度,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发现,《康熙字典》释“龚”说:“《唐韵》俱容切,《集韵》居容切,并音恭.”据此我认为,“龚”字古代主要读作罔,龚王与共王并非一人.但由于均有共字偏旁的关系,当为兄弟辈,故龚王可能是孝王的另一称呼.

朱凤瀚先生指出,新出土共王铜器年代将不少于28年.我们取共王29年,懿王3年,孝王15年,夷王4年,可得四王世金文历谱(表4).

从表4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根据我们对西周历法的认识,以既望为月望以后的一个定点,放弃了初吉的四分月说、初干吉日说、龚王为共王说、穆王在位55年说,放弃了所谓的共王标准器,专以我们所认识的词语月相推排,重新调整了四王历谱.新历谱有以下特点.

1)采纳天再旦为发生在陕南早晨的日环食记录,从而确定了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

2)《简本》以赵曹鼎为标准器,故只能将同样重要的“共王前后器”之两件既望,均置于23日.但据我们认定的历法,既望为定点18日.即使有前后两天变幅,也绝不可能到23日.更何况有两件为证.因此,这样的不合是不能允许的,需要怀疑这个标准器.

3)我们认定龚王就是孝王,并且作出了初步说明,在历谱上也是相合的.

4)这四王的金文历谱,共吸收了27条记录,已经是我们所知的全部了,没有排除不合的任何记录.这27条记录,全部合于我们所设定日序.其所在王世,也与《铜器断代》的意见一致.^①

5)我们所认定的西周历法,以朏和既望两个定点最关键.这四世没有朏的记录.其中推定初吉记录在

^① 有学者据新近发表的虢簋铭文记载“十年正月初吉甲寅”、“今朕不显考龚王既命女鬲鬲更鬲鬲乃且考事,乍鬲(司)徒.今余佳申先王命女西徒”句,以为龚王即共王,不显考即是指去世的父王共王,则时王就是懿王,可见懿王在位不少于十年.笔者既认为龚王为孝王,又不显考不一定是指去世的父亲,而是泛指高祖,故这里时王可能是指厉王.从而虢簋不是懿王在位十年的证据.

二、三、四日,虽然可以判定它可能就是初一朏日,但它与朏日的记录是两回事。既望记录却有六条,这是排谱时特别关注的。其中除共王懿王各有两个既望之外,孝王、夷王也各有一个既望。在这6个既望中,推得4个在19日,一个在17日,另一个在20日,均在设定的变幅范围之内。可见我们所推定的西周王年,都是严丝合缝的。尤其是懿王元年,原来是用日食记录推得的,是否与实际相合?还有待验证。今有两条既望记录相合,其可信度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表4 共懿孝夷金文历谱

Tab. 4 The calendar chronology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from Emperor Zhou Gong to Emperor Zhou Yi

编号	文献或器名	王年	公元纪年	年月日干支纪时词语	推排结果
共王(前928—前899)					
22	三年卫盂	共三	926	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	三月乙未朔,壬寅八日
23	达盃盖	共三	926	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	五月甲午朔,壬寅九日
24	五祀卫鼎	共五	924	五祀正月初吉庚戌	正月乙酉朔,庚戌二十六日
25	齐生鲁方彝盖	共八	921	八年十二月初吉丁亥	十二月辛酉朔,丁亥二十七日
26	九年卫鼎	共九	920	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	正月辛酉朔,庚辰二十日
27	走簋	共十二	917	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	三月壬申朔,庚寅十九日
28	师望簋、鼎	共十三	916	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	六月乙未朔,戊戌四日
29	十三年庚壶	共十三	916	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	九月甲子朔,戊寅十五日
30	休盘	共二十	909	廿年正月既望甲戌	正月丙辰朔,甲戌十九日
懿王(前899—前897)					
31	师虎簋	懿元	899	元年六月既望甲戌	六月丙辰朔,甲戌十九日
32	簋	懿元	899	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	六月丙辰朔,乙亥二十日
33	吴方彝盖	懿二	898	二月初吉丁亥……王二祀	二月壬午朔,丁亥六日
34	越尊	懿二	898	三月初吉乙卯……王二祀	三月壬子朔,乙卯四日
孝王(前896—前882)					
35	师询簋	孝元	896	元年二月既望庚寅	二月壬申朔,庚寅十九日
36	师遽簋盖	孝三	894	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	四月己未朔,辛酉三日
37	五年师遽簋	孝五	892	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	九月甲戌朔,壬午九日
38	宰兽簋	孝六	891	六年二月初吉甲戌	二月壬申朔,甲戌三日
39	齐生鲁方彝盖	孝八	889	八年十二月初吉丁亥	十二月丙戌朔,丁亥二日
40	无斿簋	孝十三	884	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正月壬辰朔,壬寅十一日
41	十五年越曹鼎	孝十五	882	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五月戊寅朔,壬午五日
夷王(前881—前878)					
42	师斿簋	夷元	881	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正月甲戌朔,丁亥十四日
43	师斿簋	夷元	881	王元年九月既望丁亥	九月辛未朔,丁亥十七日
44	元年师斿簋	夷元	881	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甲寅	四月癸卯朔,甲寅十二日
45	三年师兑簋	夷三	879	三年二月初吉丁亥	二月壬戌朔,丁亥二十六日
46	散伯车父鼎	夷四	878	四年八月初吉丁亥	八月甲申朔,丁亥四日
47	散季簋	夷四	878	四年八月初吉丁亥	八月甲申朔,丁亥四日

3.5 西周武成康昭穆王的金文历谱

在这五个王世中,虽然可供研究的四要素俱全的文献、器物并不多,但是,其中每一王世都有一个确定

的、可以作为月相定点的资料可供利用,所缺乏的是每个王世可供估计的大致年代。熟悉推步的人都知道,干支与天文月相大致有每隔五年循环一周、每隔一年后退5个干支的规律,故大致可以判断几个王年很重要。

我们既然已经推得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28年,就可以对其余王世作大致的估计。经14C测定,伐纣之年大致可限定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又有公元前1027年伐纣的看法;又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之说;武王建国后不久就去世了;又有《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记载,昭王在位19年是明确的。那么,文、武、成、康、昭前五王约计八十余年,与百年之说尚有十余年的差距,可知百年之说仅是约略之数。但成康年数与五十年相差不会太远,又据14C测定,开国至共王元年仅剩一百到一百二十余年,故穆王在位就到不了50年。因此在我们所定穆王元年不变的情况下,可推得在位48年较为合理。

覲公簋的出现,要求康王世应在二十八年以上。调整中发现庚嬴鼎和《毕命》两个定点月相互不相容,我们认为金文应比流传至今的文献更可靠一些,故决定康王王世以庚嬴鼎为准。推排的结果是康王于公元前1024—前996年在位,计二十八年;成王世为前1042—前1015年,在位十八年。

以往有些学者对我们在金文历谱中不用小孟鼎一事,既有意见,也有误会。以为我们故意隐瞒与己不合的资料。其实不然。我们所应用的,都是传统的、认为是四要素俱全的记录,至少是我们认为是小孟鼎不属于这个范围。小孟鼎说:“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廿又五祀。”在这里,既望是定点,不用干支随后,甲申这个干支是属于“辰”的。例子很多,如宜侯矢簋“四月辰在丁未”、师斿鼎“八祀正月辰在丁卯”等。关键在于“辰”是什么?我们对此缺少研究,故未将其纳入金文历谱资料。以往有些学者将辰释作朔,也只是一家之言,今暂用其说,附于表5中。按这种解释,西周人已有的朔的观念,但尚未用于历法。

由此可得西周王年如下:

武王(前1046—前1043)在位4年
成王(前1042—前1025)在位18年
康王(前1024—前996)在位29年
昭王(前995—前977)在位19年
穆王(前976—前929)在位48年
共王(前928—前900)在位29年
懿王(前899—前897)在位3年
孝王(前896—前882)在位15年

夷王(前 881—前 878)在位 4 年
 厉王(前 877—前 841)在位 37 年
 共和(前 841—前 828)共和 14 年
 宣王(前 827—前 782)在位 46 年
 幽王(前 781—前 771)在位 11 年

表 5 西周武成康昭穆五王金文历谱

Tab. 5 The calendar chronology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from Emperor Zhou Wu to Emperor Zhou Mu

编号	文献或器名	王年	公元纪年	年月日干支纪时词语	推排结果
武王(前 1046—前 1043)					
1	《武成》	武元	前 1046	一月壬辰旁死霸	正月癸酉朔,壬辰二十日
2	《武成》	武元	前 1046	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	二月癸卯朔,既望庚申十八日,甲子二十二日
3	《武成》	武元	前 1046	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	四月壬寅朔,旁生霸四日,庚戌九日
4	利簋	武元	前 1046	珣王征商惟甲子朝	二月癸卯朔,甲子二十二日
成王(前 1042—前 1025)					
5	《康诰》	成四	前 1039	三月哉生魄	三月庚寅朔,哉生魄壬辰三日
6	何尊	成五	前 1038	王五祀四月丙戌	四月乙酉朔,丙戌初吉卅日
7	《召诰》	成七	前 1036	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	二月甲戌朔,既望庚寅十七日,乙未二十二日
8	《召诰》	成七	前 1036	三月丙午朏	三月甲辰朔,丙午三日
9	《洛诰》	成七	前 1036	乙卯……戊辰,十又二月,惟七年	十二月己亥朔,乙卯十七日,戊辰三十日
10	员方鼎	成十	前 1033	正月既望癸酉,王狩	正月丙辰朔,癸酉十八日
康王(前 1024—前 996)					
11	《毕命》	康十二	前 1020	十又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	六月己巳朔,庚午二日,壬申四日
12	庚鬲鼎	康廿二	前 1003	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	四月壬辰朔,己酉十八日
13	小孟鼎	康廿五	前 1001	八月既望,辰在甲(戌)申,……惟王廿又五祀	八月戊申朔,既望乙丑十八日
昭王(前 995—前 977)					
14	静方鼎	昭十八	前 978	(十八年)十月甲子	十月癸亥朔,甲子二日
15	静方鼎	昭十九	前 977	(十九年)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	八月戊午朔,初吉庚申三日,既望丁丑二十日
16	尊、卣	昭十九	前 977	十又三月辛卯	十二月丁亥朔,辛卯五日
穆王(前 976—前 929)					
17	虢方鼎甲	穆七	前 970	九月既望乙丑	九月戊申朔,乙丑十八日
18	不斿方鼎	穆二十二	前 955	八月既望戊辰	八月辛亥朔,戊辰十八日
19	二十七卫簋	穆二十七	前 950	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	三月甲申朔,戊戌十五日
20	虎簋(盖)	穆三十	前 947	卅年四月初吉甲戌	四月丙寅朔,甲戌九日
21	鲜簋	穆三十四	前 943	卅又四年五月既望戊午	五月壬寅朔,戊午十七日

在的王世. 由于二者为上下半月的定点,其王世一旦确定,其王在位年代也就确定了. 关键是,定点有这么大的变幅吗?

在回答之前,我们对本历谱所推朏和既望的日期作一统计. 幽王没有,宣王两件均为 18 日. 由于此二王王世是已知的,无需借助于定点记录推王世. 但反过来,已知王世,又有两既望推得的日期均为 18 日,而不是 15 或 16 日,可知其上半月定点 3 日,非朔日而是朏日. 由此可以确定,整个西周都是以朏为初一. 厉王世有 3 个既望,一个为 18 日,二个为 17 日. 其中晋侯苏钟的既望癸卯,从我们的历法系统推,只可能是辛卯之误,其他都不合. 夷王的既望为 17 日,孝王的既望为 17 日,懿王的两个既望,一为 19 日,一为 20 日. 共王的两个均为 19 日. 穆王的 3 个既望,一个 17 日,二个 18 日. 昭王的一个既望为 20 日,康王的两个既望一为 18 日,一为 19 日,另一朏日为 4 日. 成王的朏日为 3 日,两个既望一为 17 日,一为 18 日. 武王的两个朏日一为 3 日,一为 4 日;两个既望,一为 18 日,一为 20 日.

综上所述,在本历谱中,朏日共有 4 个;两个 3 日,两个 4 日. 既望共有 21 个;其中 18 日有 8 个,17 日有 6 个,19 日有四个,20 日有 3 个.

有了以上统计结果,我们就有了讨论的基础.《汉书·律历志》引《月彩篇》说:“三日曰朏.”《说文解字》说:“霸,月始生,魄然也. 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所以古人知道初见新月的朏日,可以出现在平朔月的初三或初二,以初三为多数. 历法中的朏日,有没有可能出现在四日? 从汉代的日食记录可以出现在晦前二日来看,西周历法中推算的朏日出现在四日,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

由此推理,既望以平朔月的 18 日为定点,会延伸到 17、19 日,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往后再延伸一天,既望为 20 日,有这种可能吗? 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先从平朏加 15 天转换成平既望,就会带来较大差异. 由于西周历法推算不精,再加上置闰失误和一年再闰的现象,出现两日变幅是可以理解的. 要知道,一次置闰的失误,就会产生月相上的一日之差,两种偏差的叠加,会使偏差扩大,故既望出现在 20 日是正常现象.

4 朏日可为四日,既望可为二十的依据

有人可能说,一月两分,我们可以接受,但定点朏为四日、既望为二十日有可能吗? 伐纣之年为公元前 1046 年有科学依据吗?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本文用来确定王世,主要依靠既望的日期及其所

5 将公元前 1046 年作为伐纣之年的历史依据

有人批评我们说,怀疑《古本竹书纪年》西周总年这个真古,“相信假古”,不认定公元前 1027 年为伐纣

之年.说“断代工程对这样好的资料弃而不用,对这样重要的古籍将信将疑,却偏偏去相信伶州鸠的鬼话,去相信贩卖历史假货出了名的刘歆的《武成》历日,这不能不说他们在研究的大思路上迷失了方向。”

何为假古?何为真古?这件事可真不好说。《古本竹书纪年》确实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本文也从中引用了一些记录为据。^[5]但其成书年代最早超不过战国,其所载春秋史事,已发现与《春秋》经和《左传》不合,而西周“共懿孝夷四世年纪不明”早有传闻,难道《古本竹书纪年》能知道这四世的真实王年吗?不能自己不做研究,又不许别人研究,还美其名曰“怀疑真古”、“相信假古”。批评者所说的假古,指的就是《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82字。

这82字经前人多人研究,早有定论。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世俘》“除文字体例当属于周初以外,其中所记社会情形与习尚,多与卜辞及古金文中所记载者相合”,“必非后人所伪托”,“最为可信”。文中涉及伐商前后的月份、干支、月相,与《召诰》、《洛诰》、《顾命》、《毕命》记载有周公营洛、反政,以及成王临终等大事的月日干支及月相等,前后呼应,是公认的检验克商年的主要依据。

这种指责,与前人的指导意见完全相反。现将所谓的假古^[6]和真古文献^[7]合在一起加对比,与读者一起赏析是非曲直,看看谁是真古,谁是假古。表6中文字一一对应,不同之处以括弧示之,“×”为省略或没有的文字。

表6 《汉书·律历志》引《武成》与《逸周书·世俘》月日干支文字对照表

Tab. 6 Ganzhi an-nual system Comparison Table between WU CHENG(《武成》) and SHI FU(《世俘》)

文献名称	文献文字
《汉书·律历志》引《武成》(以下略称《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
《逸周书·世俘》(以下略称《世俘》)	惟一月丙(子)旁(生)魄,若翼日(丁丑)
《武成》	(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
《世俘》	(×)王乃(×)步自周,(×)征伐(商王)纣,越若
《武成》	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
《世俘》	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
《武成》	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
《世俘》	商王纣.(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
《武成》	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
《世俘》	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翼日辛亥,祀
《武成》	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
《世俘》	于(×)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
《武成》	鬲于(×)周庙.
《世俘》	鬲于周庙.

从表6中对比文字可以看出,《武成》与《世俘》就基本内容而言,是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差别,其所载月、日、月相干支,完全同步于同一年。但是,具体对比分析后,可发现有两点不同。其一,《世俘》所载二月月相干支,《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却载在三月;其二,《世俘》一月载旁生霸干支,不同版本各有不同,且与它月月相干支不相匹配,故知这些干支为后人所误改。但《尚书·武成》之一月却载旁死霸,与《汉志》所引一致。

关键的问题是,《世俘》中二月月相干支,在《汉志》中却改为三月。其中二者必有一误。熟悉历法的人都知道,如果其间没有闰月,相邻两月的干支是不会重复的。而相隔一个月则一定重复。从《汉志》所载三月干支,与一月不重复,知《汉志》所载三月月相干支,为刘歆据三统历推改。事实上,会推算三统历的人能够证明,刘歆所定伐纣之年二月确有闰月,这就找到不合的原因了。而西周使用年终置闰,《汉志》所载三月,必为刘歆误改,并引载在他的“世经”之中。这是符合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的,而不是所谓的真古假古几句空洞的言辞否定得了的。逻辑推理是研究方法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很多重要结论甚至定理,都是通过推理得出的。三月的干支不符合逻辑,所以否定了;二月符合逻辑,才被肯定,这有什么不对吗?

由此可知,《武成》有如下月、日、月相干支:一月壬辰旁死霸,越一日癸巳;二月既死霸(庚申),越五日甲子;四月旁死霸(乙巳),越六日庚戌;下一日辛亥,越五日乙卯。

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既生霸、旁死霸、旁生霸都是定点,即纪日的起点。故这里的旁生霸为朏日,旁死霸、既死霸为既望。

知道了这些月相定点干支之后,便可推定合于这些月相定点干支的年份。根据“断代工程”14C测定的伐纣的年份,介于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最优解当落在这个范围。

再从另一头说起。我们既然放弃了赵曹鼎是共王标准器的认识,也就决定了穆王不可能在位55年。则55年这个王世一定可以压缩。穆王最高龄铜器和标准器为34年鲜簠,我们暂时可以确定已经建立起来的武王至穆王元年的框架不变,穆王王年不能少于标准器34年,那么穆王在位之年有48年、43年和38年的三种可能。48年与公元前1046相配,43年与公元前1041相配,38年与公元前1036相配。但前1036年虽与《武成》相合,成王的《召诰》却不能配合;前1041年则不如前1046年配合得严密。故我们最终选择了伐纣之年为前1046年。现将公元前1046年克商

详细历日介绍如下。

公元前1046年1月癸酉朔(据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8]壬辰旁死霸20日,下一天癸巳21日,武王离开宗周开始伐商纣王。二月癸卯朔,23日甲子,前五日庚申既死霸18日。甲子这一天杀死了商纣王。从1月20日到2月22日,共用了32天。《尚书·武成》补充说,二月戊午16日这一天,师渡孟津地区的黄河,癸亥21日,夜陈于商郊。甲子早晨,会师于牧野。《世俘》则补充说,甲子夕,纣王取五玉环身以自焚。武王随即征伐不服者,俘商恶臣百人。三月壬申伐卫,庚子命伐磨、宣方、蜀。四月壬寅朔,庚戌9日,其前六日乙巳,为4日既旁死霸,武王在周庙祭拜祖先。下一日辛亥10日,即天子位。越五日乙卯14日,武王祀馘周庙。

将以上《武成》、《世俘》克商年一月至四月计十余条月日月相干支,与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的合天历作出拟合可以看出,其所有月、日、月相干支都是相合的。请读者特别注意,这里所有的月相干支,例如旁死霸、既死霸、既旁生霸等都是定点月相。在一年之内的4个月中有3个定点月相与其相合,且没有游移,这是很难找到的。它既合于¹⁴C测定的克商范围,也合于成康之际四十年刑措不用文献记载,是这个时代利用多学科合作找到的最优解。由此显示出多学科合作的优越。没有多学科合作,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成果的。

至于武王在位4年的理由,我们的回答首先是,历法推算和逻辑推理方面的必然结果。故当我们初次据《召诰》和《武成》推定,武王在位四年时,竟然回答不出在位四年的历史依据。这个推理是,既然昭王元年已经确定,则据“成康之际四十年刑措不用”的记载,成王亲政加康王不应少于40年。加上周公七年执政时的东征西讨,武王在位只能是四年。之后李学勤首先推出《武王在位有四年说》,后来发现当代持四年说观点的并不少。当《周本纪》说:“九年武王上祭于毕”时,当即受到张守节正义的批评,指出据《尚书·泰誓》,武王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克纣,十五年疾,后四年而崩。太史公以十一年伐纣,“武王在位年数,与《尚书》违,甚疏矣。”故张守节即据《尚书》推为四年,武王在位四年当为正解。可惜的是,至今仍有人利用司马迁的失误,坚持武王二年说或三年说。

批评者说我们“相信伶州鸠的鬼话”、“研究思路上迷失了方向”,这又是张冠李戴了。1997年9月在空军招待所召开的武王克商之年的研讨会上,课题组汇报完研究结果,主持人俞伟超先生指名要我对他们得出的公元前1044年作出评价。我当即回答,“推算

都很精当完美,只是前1044年的月相反了。”由此可以证明,在此之前我们已选定公元前1046年作为伐纣之年。只有这样,才能立即说出“方向反了”这一结论。这是《简本》伐纣之年不用前1044年的主要依据。

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还有一个可靠的天象记录作为实证。大家都知道,商代最后一个王是纣。据《竹书纪年》记载,商王纣三十二年发生了一次五星聚会的天象。由于这是异常罕见的特殊天象,史官们才记载下来。当时因纣囚禁周文王而结下怨仇,这时文王已经积聚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灭商做好了准备。当文王见到天空出现五星聚会的天象时,以为这是上帝的授意,便将其下一年称为受命元年。这是合于即位纪元规定的。但是,文王受命后只活了9年。武王继承了文王遗志,不再改元,仍沿用受命年号,直到受命十一年八百诸侯会师孟津观兵,十三年二月甲子完成克商大业。这件事《尚书·泰誓》就有记载。^[9]《汉书·律历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此事已经变得很简单,只需验证一下商王纣三十二年是否发生五星聚会以及与受命十三年能否衔接得上就可以了。五星运动的位置,人们早在二、三百年前就能够精密推算了,而且有现成的工具书可以方便地查找。这些简单的问题一直未有人想到,直到最近几年,汉学家美国人班大卫撰《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他将这次五星聚会的时间定在公元前1059年5月。五星聚集在鬼宿附近的^{4°}范围之内。同时还有“大赤乌集于周社”的记录。由此便可推断出武王受命十一年观兵,十三年克商的结果。^[10]

班大卫推定的这一结果,正好与“断代工程”据金文历谱所定克商之年相合。当我们初次读到班大卫这篇论文时,并没认识到这一推论对于确定克商之年的价值,还认为也仅是普通的一家之言。直到我们最近撰写推定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的依据时,重读此文,才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价值。可以肯定地说,有了此五星聚会的天象记录为证,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已成为不可动摇的铁定事实。也只有通过金文历谱诸多文献和月相论证,与五星聚合天象记录不谋而合,才能得到确定无疑的结果。不然的话,人们仍然只能将信将疑。

事实上,北京国家天文台的赵永恒教授,已先于我们认识到这一发现的价值。他说,他利用《瑞士星历表》软件,推算到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确实有五星聚于鬼宿的天象,从而推得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他最后总结说:“我同意此结论。”^[11]可见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早在40年前,张钰哲与张培瑜撰写《殷周天象和征商年

代》中,已经指出了这次五星聚会的时间为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聚集的星空为井宿6°的范围,与班大卫、赵永恒所推基本一致。可惜他们只注意到《新论》和《春秋·元命苞》的记载,时间只是“殷周之际”。他们如果注意到《竹书纪年》所载五星聚会距克商的年数,他们可能早就提出前1046年这个伐纣之年了。见班大卫著,徐凤先译.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A].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27—334).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西周总年为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由此推定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这便是有些人认定的、不可动摇的真古记录。从上节的介绍可以认定,《古本竹书纪年》的作者充其量可以认定是魏国史官,他没有经过西周和春秋的动荡年代,没有什么根据说它是真古。其实,真正的真古是《世俘》。只有它,才是当时见证的实录。只是现今所见到的文字,由于整理人因简牍排列错乱而产生混乱。

因此,《世俘》的文字是客观存在,后世任何人也不可能编造出这样完整、系统的伐纣记录。它是检验真假克商之年的唯一标准,绝不是伪造之类的话所能诋毁得了的。

现在以合天历来检验公元前1027年《武成》和《世俘》历日月相。前1027年一月壬午朔,“壬辰旁死霸”为11日。既不合刘歆的上半月为死霸、下半月为生霸的月相定点说,更不合四分月说。二月壬子朔,“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可推得既死霸庚申13日,也与诸说不合。四月辛亥朔,“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可推得庚戌为朔前一日,再往前六日寻找旁生霸就更无意义了。由此可见,前1027年,与《武成》、

《世俘》是完全不合的。从而可以证明前1027年不可能是伐纣之年。

致谢: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曾得到历史学、考古学界李学勤、朱凤瀚、彭裕商、王世民、张长寿和同行席泽宗、张培瑜等诸位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指导,特此表示感谢,以志不忘。文中的责任,全由作者个人负责。

[参 考 文 献]

-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30—35.
- [2]张公瑾、陈久金.傣历研究[A].《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编辑组.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二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180—186.
- [3]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4.
- [4]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41,47,156.
- [5]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7.
- [6]见《前汉书·律历志·世经》所引《武成》.前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7:101.
- [7]见《逸周书·世俘》.逸周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7:32—34.
- [8]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M].济南:齐鲁出版社,1987:39.
- [9]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203—204.
- [10]班大维(David W. Pankenier). The Cosm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Heaven's Mandate(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J]. Early China (20), 1995;或参见,班大卫著,徐凤先译.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A].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27—334.
- [11]赵永恒.唐虞夏商天象考[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1,(2).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黄招扬]

A Revision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Zhou Kings in The National Xia Shang Zhou Chronology Project

CHEN Jiu-j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enior historian of calendar,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methods used in the research of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Zhou kings and the hypotheses on calendar model in west Zhou dynasty. Also, this paper repositions the Western Zhou calendar: Revising the traditional ideas, deducing the chronology of Western Zhou kings. By a combination study of historic literatures, inscription records on the bronzes, the Day Dawned Twice (Tianzaidan) and conjunction of the five planets (Wuxing Juhe), a relative satisfactory result has been obtain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revises again and ascertains the true era of the so-called King Gong Standard object.

Key Words: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Zhou kings; Day Dawned Twice (Tianzaidan); Conjunction of the five planets (Wuxing Juhe); the year of the conquest of Shang by King Wu